第 57 卷 第 5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57, No.5
2020 年 9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Sep. 2020

对华认识、国际秩序观对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决策的影响

宋志勇[1] 朱丁睿[2]

(1. 南开大学 日本研究院,天津 300071; 2.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 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决策过程相当复杂,影响因素很多。这其中既有长期的近代以来大陆政策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膨胀的侵华野心,也有七七事变必然性和偶然性并存的特殊性。但根源还在于日本错误的对华认识及国际秩序观。这一错误集中表现为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的国家意志,但它的构成却是来自不同的影响国家决策的集团和个人。本文选取了军部特别是其“中国通”、政府首脑、智库三个样本,分析了他们的对华认识及国际秩序观是如何影响侵华战争的。轻视甚至蔑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中国政府及人民的抗战决心、建立以日本为霸主中国为附庸的东亚新秩序,是日本把七七事变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的主要原因,也是日本对华认识的主流和影响日本对华决策的主要因素。日本虽然也存在一些抱有对华客观认识的智库和明白人,但始终没能成为国家对华认识的主流,没能起到制止或中止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作用。

关键词: 全面侵华战争;对华认识;国际秩序;近卫文麿;中国抗战力调查

中图分类号:K 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0)05-0102-07

日本将七七事变从一局部冲突发展成全面侵华战争,经历了一个短暂却是复杂的决策过程。而此过程又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既有长期以来日本大陆政策的惯性,又有日本对苏和世界战略的考量,还有舆论的压力等等。但日本各界的对华认识、国际秩序观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本文选取了军部、政府首脑、智库三个样本,看看他们的对华认识及国际秩序观是如何影响对华战争的。

一、军部的对华认识

毫无疑问,在日本全面对华侵略战争中,军部是主角。由于近代日本政治体制中统帅权独立,军部不受政府约束。特别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他们不仅独揽军权,还粗暴干政,成为国家政策决定过程中的主要势力。思想决定行动。七七事变前后,日本军方的对华观对日本侵华战争从局部冲突扩大到全面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七七事变从局部冲突发展成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对中国的误判。而这种误判源于日本长期形成的对华观。其中军方错误的对华观影响尤大。它既有对中国社会及发展的误判,也有对中国抗日决心和能力的误判,多种误判的结果,致使日本发动了害人害己的全面侵华战争。

在军方的对华认识中,对执政党国民党的认识占有重要地位。本来,国民党成立之初,孙中山等领导人与日关系密切,双方关系不坏。但 1924 年国民党“一大”决定实行国共合作,提出反帝纲领,特别是 1928 年国民党政权发动第二次北伐,并将青天白日旗插到东北,实现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之时,日本军方认为这威胁到日本的在华利益,特别是“满蒙权益”,断定国民党政权的存在阻碍日本对华政策的

收稿日期:2020-03-20

作者简介:宋志勇,男,山东临朐人,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决策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9ZDA220)阶段性研究成果。

实现,故开始对国民党采取敌视态度。虽然日本承认了南京政府,但并未改变对国民党的认识。

1933 年,陆军省调查班在其编写的《中国国民党的概观》的报告中,对国民党作出了如下评价:北伐结束后,国民党"就失去了目标,革命元气大为衰退。党堕落,党员腐败,官吏以卖官兼职为能事,财政混乱无序,苛政滥行与军阀时代无异, 国民党不过是取代旧军阀现身的新军阀而已"。① 该报告的这一评价代表了日本军方对国民党及其政权的基本认识。"中国通"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矶谷廉介少将也认为,妨碍日中关系安定及造成中国内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指导精神"。他认为国民党领导层把纯粹的"国民革命"改变为"共产革命"。只要国民党领导层的这一"指导精神"不改变,中日关系和中国内乱就不会得到"根本的解决"。②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方否定国民党的态度反映到对华政策上,就是在策划分裂华北活动中彻底排除国民党的势力。如 1935 年 6 月日军强迫中方承认的"何梅协定"就规定,河北境内的所有国民党党部必须全部撤离。一直到七七事变,日本军方仍不愿承认国民党政权的正统地位,并策划各种阴谋,打击国民党南京政权。

尽管日本军方否定国民党和中国统一、片面的轻视中国的对华观占据了主流,但日本还是有些有识之士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意识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成长和国家统一的大势。特别是部分军界中的"中国通",他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认识国民党政府的正统地位。如七七事变前夕参谋本部派驻日本驻华大使馆的楠木实隆大佐等在向军部提交的"对支政策意见"中谈到:

> 纵观中国现状,反中央各派虽尚存,但无论哪派都无法彻底地颠覆现中央政府,各派都力图在现任政府组织机构内安插自己的势力。因此,我若徒然坚持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或分裂华北五省等旧观念,势必适得其反。深信应迅速改变旧式观念,堂堂正正地以中央政府为对象进行交往。不以南京政府为对象,通过威逼利诱地方政权引导日支邦交的政策,是只知日清、日俄战争时代的支那,而不知中国现状的表现。③

但楠木实隆等"对华再认识派"势单力薄,始终没有成为日本对华认识的主流,而"否认中国的民族统一,否认以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心的统一,以分割中国或者将中国完全殖民地化为目标"一直是日本对华认识及其对华政策取向的主流。④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卢沟桥的几声枪响之所以能够演变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推行贪得无厌的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围绕事变的处理,日本军部出现了"扩大派"和"不扩大派"的分歧。"扩大派"和"不扩大派"的产生,实际上是军内不同对华认识的反映。"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是大权在握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这位九一八事变的主谋,对七七事变采取了迥然不同的做法。根据他的世界战争理论,日本的主要对手是苏联和美国。他担心对华出兵、扩大事态会有陷入战争泥潭的危险,同时顾虑如果苏联出兵,会使日本腹背受敌,故主张"不扩大"事态。他反复解释其理由:"现在的支那不是以前的支那,国民党的革命取得了成功,国家实现了统一,国民的国家意识正在觉醒。如果走向日支全面战争,支那就会利用辽阔的领土进行持久战,而日本的力量是不能将其降伏的,日本会陷入战争泥潭动弹不得。"⑤7 月 31 日,石原还利用向天皇"进讲"的机会,汇报了华北局势及今后对华作战的前景。他特别强调,进攻以推进到保定一线为限,而当前最为紧迫的是"在推进到预定线之前如何尽快通过外交折冲寻机撤兵"。⑥ 实际上,这也是希望得到天皇对其不扩大主张的支持。

---

① 戸部良一『日本陸軍と中国:「支那通」にみる夢と蹉跌』、東京:講談社 1999 年版、第 178 頁。

② 波多野澄雄「日本陸軍の中国認識–一九二〇年代から三〇年代へ」、井上清·衛藤瀋吉編著『日中戦争と日中関係:盧溝橋事件 50 周年日中学術討論会記録』、東京:原書房 1988 年版、第 233 頁。

③ 島田俊彦·稲葉正夫編『現代史資料 8 日中戦争(一)』、東京:みすず書房 1964 年版、第 389 頁。

④ 西村成雄:《"中国统一化论争"的历史认识》,《日本学论坛》2002 年第 3 期,第 96 页。

⑤ 武藤章『軍務局長武藤章回想録』、東京:芙蓉書房 1981 年版、第 96–97 頁。

⑥ 宮内庁編『昭和天皇実録』第七、東京:東京書籍 2016 年版、第 385 頁。

但不扩大派力量微弱,很快就被扩大派淹没。扩大派认为,“支那是一个不可能统一的分裂的弱国,日本如果表现出强硬的态度,它立刻就会屈服。此时需要屈服支那,把华北五省基本上纳入到日本的势力之下,与满洲相结合,强化对苏战略态势。而卢沟桥事件带来了实现这一目的求之不得的好时机”。而上述思维是“满洲事变以来陆军领导层不变的对支观、对支方策”。① 参谋本部总务部长中岛铁臧也回忆到,当时“扩大派”主张“日本的敌人是苏联和中国。现在正是各个击破、先打垮中国的最佳时机,此时要坚决给中国以痛击。现在中国还没有像样的抵抗能力,只要拿下天津、北平,中国基本上就认输。如果再进一步拿下上海的话,本年 12 月间蒋介石就会倒台”②。军方的对华认识既然如此,就不难想象七七事变会从小规模的局部冲突发展成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了。

无视、轻视甚至蔑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中国政府及人民的抗战决心,是日本把卢沟桥事件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甲午战争以后,日强华弱,日军骄横成性,形成了一种蔑视中国的惯性,认为只要日本军事施压,中国就会屈服。这种骄横傲慢抑制了他们的正常思维,使他们看不到中国国力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看不到日本的侵略激起的中国人民从未有过的民族凝聚力和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意志。所以,当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军部在错误、落后的对华认识的指导下,沿袭“惯性”来处理事变,酿成了长达八年的全面侵华战争,并最终在中国人民的坚强抵抗下,以失败告终。

二、近卫文麿的东亚秩序观

在把七七事变推向全面侵华战争的日本最高决策层里,首相近卫文麿当然是重要人物之一。不少研究认为军部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决策过程中扮演了主角,而政府只是配角。这是一种误解。在七七事变从局部冲突演变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国家决策过程中,政府和军部共同构成了主角,政府也负有最高的责任。而近卫作为政府最高负责人的表现也证明了这一点。

近卫出身贵族,很受天皇信任,又倡导“革新”,受到军部和民众推崇,是一位深受天皇和国民期待的年轻政治精英。近卫不仅精通国内政治,对国际关系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通过长期对国际秩序的观察与思考,于 1918 年 12 月发表了《排除英美本位之和平主义》的文章,阐述了自己的国际秩序观。在文中,近卫旗帜鲜明地抨击了既存的以英美帝国主义为本位的国际秩序,提倡以“日本人本位”来看待和评价战后国际秩序,并提出了“国民生存权”,倡导国际间的“正义人道”“人种平等”和“移民自由”。近卫的这些理念与主张,成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提出“东亚新秩序”的理论基础。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野蛮的侵华行径受到国际联盟及西方列国的谴责。但近卫却不以为然,认为日本的行动是“正当的”,并搬出了“正义人道”论来进行辩解,说什么日本对世界和平事业抱有巨大热情,选择发动武力事变,是追求经济交通自由和移民自由两大国际“正义人道”原则不得已的举动,也是为了追求日本自身的生存空间。③

1937 年七七事变前夕,近卫奉天皇之命组阁,出任首相。自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日本迅速走向法西斯化,“打破现状”成为日本内政外交的主流。这与近卫所提出的打破“英美本位”的世界秩序,建立以日本为本位的世界秩序理论不谋而合。具体到东亚,日本通过发动九一八事变,已经开始“打破现状”,“除旧立新”,尝试建立新的东亚国际秩序。近卫上台后,又从其智囊团“昭和研究会”的精英知识分子那里,吸收了“东亚协同论”等新的支配东亚的思想观念。④ 近卫组阁后不久,七七事变爆发,这

① 武藤章『軍務局長武藤章回想録』、東京:芙蓉書房 1981 年版、第 97 頁。
② 秦郁彦『盧溝橋事件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1996 年版、第 298 頁。
③ 近衛文麿「世界を改造せよ」、『清談録』、東京:千倉書房 1936 年版、第 255 頁。
④ “昭和研究会”是近卫的私人国策智库,于 1933 年底组建。1936 年 11 月为配合近卫上台而正式成立。其成员都是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社会精英,为日本的内政外交出谋划策,对近卫影响较大。

就为近卫实践自己的国际秩序思想提供了机遇和舞台,完成了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深化过程。

七七事变初期,仍然表现为中日之间的一场局部冲突,且规模不大。如果不是日本最高决策集团决意扩大侵略行动,事变也许就会在国民革命军第 29 军和日本华北驻屯军的驻军之间就地解决,不至于升级为中日全面战争。但当时,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军部,都希望借事变向中方发难,以武力为后盾全面解决中日关系问题,特别是华北"特殊化"问题,最终导致七七事变扩大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这其中近卫首相就扮演了战争推动者的角色。①

事变初期,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在对策上发生分歧。军部的"不扩大派"从东亚及世界战略考虑,不希望战争无限度扩大,让日本陷入战争泥潭,影响对苏战略,也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共同压制"扩大派"。但近卫首相仅就政府的"不扩大方针"矜持了几天,就与"主战派"沆瀣一气,支持向华北派兵扩大战争,并亲自向各界动员,还叫停了中日"陶德曼调停",使中日战争规模一再扩大。半年内,日本占领了华北和华东的大片中国领土。尽管如此,中国没有屈服,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支持下,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迫使中国投降的企图。在此形势下,1938 年 1 月 16 日,近卫发表声明,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待能与帝国真诚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诞生与发展,并将与其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② 近卫声明表明,"日本政府自己关闭了和平的大门"。③ 与此同时,近卫还在声明中施展分裂中国惯用伎俩,一方面打压蒋介石,另一方面引诱反蒋亲日势力另起炉灶,追随日本搞所谓"东亚协同体"。④

但近卫声明抛出之后,并没有获得预想的效果。虽然日本占领了武汉、广州等中国的重要城市,但中国仍坚持抗战,中日战争进入相持的持久战,日本陷入战争泥潭。为了打破僵局,11 月 3 日,近卫发表了第二次声明,并提出了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诱饵。所谓"东亚新秩序",就是"日满支三国相提携,树立贯穿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互助合作之关系。"近卫在声明中还特别强调:"帝国深信不疑,各国也将正确认识帝国的意图,适应东亚的新形势。"⑤

第二次近卫声明的意义有两点:一是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近卫一战以来的国际秩序观发生了延伸和深化,将一贯坚持的排斥英美本位的国际秩序,发展到以武力建立日本本位的新的东亚国际秩序,而这一秩序当然是由日本主导的,因为其"渊源是日本的肇国精神。完成这一建设,是赋予当今日本国民的光荣职责"。⑥ 而中国的地位就是"参与其中",说白了就是日本的附庸。第二个意义是警告欧美列强,要求他们承认东亚国际秩序的改变,即欧美支配东亚的时代过去了,今后将是日本主导东亚新秩序的时代。

12 月 22 日,近卫又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公开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近卫三原则",即"善

---

① 这也是战后近卫被列入甲级战争嫌疑犯名单的主要原因。他在自杀前反省到:"七七事变以来,我在政治上犯过许多错误,对此深感自己的责任"。細川護貞:『細川日記』、東京:中央公論社 1978 年版、第 460 頁。

②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国立公文書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A-1-0-0-12_003·厚地盛茂編:『近衛首相演述集　その二』昭和 14 年 14 年 2 月 11 日、第 11 頁。

③ 原俊洋、奈良岡聰智『ハンドブック近代日本外交史』、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 2016 年版、第 234 頁。

④ 所谓"东亚协同体论",就是以东西方文明对立、中日"同文同种"为前提,打着"民族协同"的旗号,目的是将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引诱到对日"合作""协同"上来。参见史桂芳《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东亚协同体论》,《历史研究》2015 年第 5 期。

⑤ 近衛文麿「東亜新秩序建設の声明」、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厚地盛茂編『近衛首相演述集　その二』昭和 14 年、第 12 頁。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B02030031600。

⑥ 近衛文麿「東亜新秩序建設の声明」、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厚地盛茂編『近衛首相演述集　その二』昭和 14 年、第 13 頁。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B02030031600。

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① 这个三原则看起来冠面堂皇,但实际上包藏祸心:“善邻友好”要求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要求继续在中国驻兵,“经济提携”要求为日本对华掠夺资源“提供便利”。至此,近卫的“东亚新秩序”的目的昭然若揭。近卫的国际秩序观终于从理论走到了行动,其目标也清晰可见,那就是排除欧美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支配,“破旧立新”,建立以日本主导的东亚新秩序,把中国纳入到日本掌控的这一新秩序中。近卫的这一主张这与日本军部的主战派不谋而合,进而主宰了日本对华政策的方向。

三、国策智库的中国抗战认识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除了军部、政府的对华认识对战争决策产生了直接的作用外,智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其中,“国策会社”满铁的智库就是典型之一。满铁全称“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 是日俄战争后日本在华最大“国策会社”,“具有浓厚的军事和政府支配工具的性质”。② 满铁特别重视智库作用,专门设立了调查部,搜集情报,分析研究,提出政策建议,为满铁及日本政府及军部的侵华政策服务。1939 年 4 月,为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政府批准满铁调查部重组扩张,成员达到二千余人,汇集了各个领域的研究人才,成为“日本创设的空前绝后的‘智库’”。③

1937 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坚决抗战,挫败了日本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企图,中日战争呈现出相持的持久战的态势。中国的抵抗能力有多大,还能持续多久,日本应该如何调整政策,这些成为日本战争决策集团最为关切的问题。为了客观、准确地评估中国的抗战能力,1939 年 5 月,满铁调查部集中了三十多名中国问题专家和调查员,成立了“支那抗战力调查委员会”团队,对中国的抗战实力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全面调研,于 1940 年 6 月提出了洋洋百万字的《支那抗战力调查报告》。报告从总体战的角度全面分析了中国的综合抗战实力,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报告认定,在日本对华战争面前,中国形成了包括民族资本家和地主阶级在内的“全民抗战”态势。报告对支撑抗战态势的中国社会性质及抗战现状进行了宏观和微观的系统分析,认为:

(一)中国目前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报告书认为:“支那社会自清朝崩溃以后,虽然变得非常复杂,但基本上是一个半殖民地状态下的半封建国家。”④中国是列强“共同”的殖民地,国家经济主要是“非常落后散漫”的农业经济,大部分商业城市寄生于农村经济。虽然拥有若干以工业为中心的现代化大都市,但骨干产业多为外国资本把持。民族资本基本上都以轻工业为主,与军事工业相关的重工业皆已丧失。而中国的军队缺乏现代国家军队的素质,难以统制,主要军备又受制于列强,“军事水平低下”,难以应对对外战争特别是与“现代化国家的战争”。⑤

(二)中国在缓慢地向现代国家发展。特别是一战后,中国的民族资本发展很快,并“开始维系这个国家独自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与此同时,中国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相伴而生,成为中国社会农民阶级之外的“新要素”。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也逐步走向统一和体系化,由此“形成了中国抗战力的母体”。中国的现代政治势力将在动员民众投入战争的过程中提高治国水平。中国最大的政治势力国共两党目前暂且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合作抗日,这两大严重对立的政党“将通过极为复杂的过程形成抗战能力”。⑥

---

① 近衛文麿「日支国交調整方針に関する声明」、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厚地盛茂編『近衛首相演述集　その二』昭和 14 年、第 7-8 頁。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B02030031600。

② 満鉄調査部編『支那抗戦力調査報告』解説、東京:三一書房 1970 年版、第 575 頁。

③ 草柳大蔵『実録満鉄調査部』上、東京:朝日新聞社 1979 年版、第 14 頁。

④ 満鉄調査部編『支那抗戦力調査報告』総篇、第 11 頁。

⑤ 満鉄調査部編『支那抗戦力調査報告』総篇、第 11 頁。

⑥ 満鉄調査部編『支那抗戦力調査報告』総篇、第 12 頁。

(三)中国农村社会虽然落后,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只要政治领导得力,就会成为抗战的依托。中国农村与城市的联系不像现代化国家那样紧密,“即使城市丧失了,农村依然有很强的自给自足能力”。也就是说,“尽管城市被占领,农村仍然可以作为抗日阵营的根据地存在,这也是由支那社会的特质决定的”。这种独特的农村经济及内地经济的存在,成为中国“对日进行消耗战(长期抵抗)或‘持久战’的经济基础”。①

(四)关于外援问题。报告认为,国外的对华援助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列强为防止被日本排挤出中国而对华援助,“英美法等对华援助的本质是对日牵制和对华支配”。另一种情况是中国的抗战被视作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出手援助。报告指出,日本虽然占领了沿海地区,切断了中国大部分外援的路径,但是重庆政府还是会动员一切力量争取外援,因为它事关中国抗战的成败。

应该说,调查报告对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的定位、对中日持久战的判断、对国共既合作又斗争形成抗日核心的分析以及对外援的认识还是比较客观、准确的。

报告还分析了“支那抗战能力的阶段性问题”,认为中国的抗战能力具有阶段性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了中日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支那事变的各个时期,军事与政治的重要性有所不同,它表现在支那抗战能力中军事与政治的不均衡发展”。报告书指出:“武汉会战前是主力战阶段,此后则是政治、经济战的阶段。”②

报告写道:“在支那抗战力的形成中,政治的作用非常大。”而成为政治中心的政党及其领导动员的民众力量,是中国抗战能力的核心,这是由军事和经济力量薄弱的中国国情决定的。但政治恰恰是中国抗战中“最动摇、最落后”的部分。如果中国的政治矛盾激化,必将失去对抗战的领导,“支那的抗战力将丧失大半”。③

关于中国抗战的军事实力,报告认为,经过华北、淞沪、武汉几大会战后,中国的军事力量遭受了重大打击,损失惨重,但仍保持相当的抗战能力,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军主力和八路军是中国“抗战派的军事支柱”。同时,蒋介石利用抗战,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军事控制。而在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在日军占领区进行的游击战争将成为主要战斗”。④

值得注意的是,战争爆发后,日本一直把国民党领导的正规军作为主要对手,对中共领导的军队不甚重视,但此次特意调研了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情况,并给予了很高评价。报告认为八路军通过广泛的“独特的民众动员”,坚持持久战,建立了敌后根据地,通过破坏日军后方兵站及交通通信设施等手段,扰乱了日军后方,牵制了日军进攻,打击了日本扶植的伪政权,破坏了日本的战争经济计划。⑤

关于今后的对华政策,报告认为在日本即将南进与英美开战的形势下,应“迅速解决”中国问题。“全面解决当然最好”,即使不能全面解决,如果部分解决也切实能减轻日本的战争负担的话,“也有必要考虑”。考虑到全面军事攻势“显而易见”的困难,报告认为德国中介的政治解决将是重要的选项。⑥受环境所限,报告没有明言日本侵华战争会以失败告终,但以中国顽强的抵抗力暗示日本打不赢这场战争。

客观地讲,《支那抗战力调查报告》对中国抗战的观察和认识虽有错谬之处,但大体符合中国的实

---

① 満鉄調査部編『支那抗戦力調査報告』総篇、第 12-13 頁。

② 満鉄調査部編『支那抗戦力調査報告』総篇、第 13 頁。

③ 満鉄調査部編『支那抗戦力調査報告』政治篇(I)、第 100—101 頁。

④ 満鉄調査部編『支那抗戦力調査報告』政治篇(I)、第 136 頁。

⑤ 満鉄調査部編『支那抗戦力調査報告』政治篇(I)、第 185 頁。

⑥ 満鉄調査部編『支那抗戦力調査報告』総篇、第 88-92 頁。

际。该报告受到了政府和军部以及侵华日军高层的重视。调查报告作为“机密”材料由日本战时大本营分发给军方高层参考。① 参谋本部、陆军省、海军省、兴亚院、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等军政部门,多次邀请调查员做报告或进行座谈,听取了他们对中国抗战形势的分析。满铁调查部智库的对华抗战分析,肯定会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和战略调整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The Influence of Japanese Knowledge of China and its View of International Order upon its Decision Making During the Japanese Aggressive War Against China

Song Zhiyong[1], Zhu Dingrui[2]

(1. *Japan Institut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2.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July 7th Incident (七七事变) or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 (卢沟桥事变) in 1937,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was extremely complicated, impacted by various factors. They included the influence of Japan's long-term Kontinental Politik (大陆政策), its inflating ambitions to invade China after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or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九一八事变) in 1931, and the co-existence of inevitability and contingency concerning the outbreak of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 itself. Nevertheless, the main reason behind was undoubtedly Japanese faulty knowledge of China and its view of international order, which eventually led to a national will to launch an aggressive war against China. However, the decision to launch the war was constructed by different groups and individuals, which took shape in different forms and comprehensively impacted the wartim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his paper selects three samples respectively from the military division, especially its “China experts”, the head of government, and the think tank, intending to explore how their knowledge of China and view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fluenced their aggressive war against China.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main reason why Japan expanded the scale of war from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 into the full-scale aggressive war against China, was closely related to Japanese under-estimation and ignoranc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Chinese society, as well as the Chinese people's determination to resist the Japanese invasion, along with Japan's intention to establish a new order in East Asia, which regarded Japan as a hegemony and China as a subsidiary. It was also the mainstream of Japanese knowledge of China and the main factor which influenced Japan's decision making about China. Although there were some think tanks and individuals who possessed objective knowledge of China at that time, they failed to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Japan's national knowledge of China, and also failed to play the role of preventing or stopping Japan's aggressive war against China.

Key words: all-out War of Japanes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knowledg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order, Fumimaro Konoe(近卫文麿), survey on China's resistance capability

(责任编辑　管　琴)

① 大本営陸軍部「支那抗戦力調査資料送付の件」、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C04122985000。